

新书《见证中国和平崛起和友好发展》出版 2

韩英平和马咏南为吴志曼文集之二写感言和序文

同住,收割 的东西也不够吃,就吃番薯藤和木薯混合的粗粮,平时还要捡狗粪,牛粪做肥料。

因为房间小,捡回的牛粪只能放在房间里,吃饭也在那里吃,而要解手的时候就要在门后面解决。

这样在惠阳县一带呆了两年多的时间。

那时在村里的一位孤老太太,很感激乌玛尔,非常疼爱他,把他当儿子来看待。乌玛尔对她说:“不要叫吴同志,叫我志曼就好了。”老太太在乌玛尔离开时哭得非常伤心。

进入北大念历史系

土改结束后,乌玛尔更名为吴端仁。1953-1954年他被调到广州华侨补校总务处任食堂管理员,在大冷天里,每两天一次早晨五点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买菜。补校建好后乌玛尔终于实现了自己读书的愿望。

他进入到了中山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

学。

该校有很多高干子弟学生,也有朝战的残废军人、解放军专业军人...如前解放军。

后勤部长邱会作中将之妹邱莲凤、方方之女方惠平、康生的警卫员马长功等等。他们都被要求在三年内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。

当时大部分人都是小学毕业水平,乌玛尔虽是外国人,学习起来却比其他学生要好,中文成绩常常名列全校第一。

1958年,他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念历史系近代史。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当时也在北京大学学习古代史,两个人在上大课时常常见到面。乌玛尔评价李纳很聪明,也很自立。无论冬夏都是自己骑车上学,父亲从来都不接送。乌玛尔在放假时用省下来的钱去过莫斯科,到过河内,还受到过胡志明主席的接见。

当时印中友好关系密切,苏加诺总统和外长苏班特里奥等领导人先后到访北京,吴

志曼等通晓中印度尼西亚文的大学 生,被邀请参与交流或陪团活动,受到印度尼西亚军方的重视,为他们后来回国奠定基础。

1957年我与乌玛尔在广州结婚,我是 泰国华侨,两人1958年到北大,在北京 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。我们在北大有 一套房子,和讲师教授们一起住。我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那里出生,并在北大后面的幼儿园念书。李纳和我是同班同学,我们感情很好,她常常来我家里和孩子们玩耍。

八年牢狱之灾, 乌玛尔谱写不一样命运之曲

1963年我们一家人回到印度尼西亚,两人都在新华日新任教,分别教汉语和历史。

1965年9月30日,印度尼西亚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开启了军政统治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历史,开始铲除异已分子,手段残忍,许多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入牢。乌玛尔也无法逃避这一浩劫。就在1968年的一个宁而不静的夜晚,给蒙面带走了。还没收了一些书籍以及毕业证书。

故意兜兜转转近两小时,带到了其实离他家不远的丹拿望监狱。

他在监狱的日子苦不堪言,环境恶劣,还常遭酷刑逼供,迫打双耳导致耳膜流血,还不让求医。他们认定乌

玛尔是卧底的特务,尤其乌玛尔在中国居住长达十五年之久,更视他为眼中钉,将他和同僚们隔离开来,不能互相交流,以免他们密谋逃狱。尽管他受尽严刑拷打逼供,但他始终坚决地表示,他只是在北京读书,然后回印度尼西亚 教书。

乌玛尔确信当局是不会杀死他的。

一段时间后,当局无计可施,只好把他送到了沙冷巴(Salemba)大监牢,一个刑事犯监狱。里面的罪犯都是涉及抢劫、强奸 等失去道德的社会败类,乌玛尔转到这里,带去的衣物、药品都被这些囚犯洗劫一空,环境之恶劣更为严重。这里条件更糟,一个 礼拜只给洗一次澡。由于天气燥热,几个月 以来只是换一套衣服,不能洗换,很多人因而得了湿疹,乌玛尔也不例外。

到1970年,伦敦人权委员会责成印尼当局,对1965年“九三〇事件”的犯人作出速审速决的举措,因此三个月之后,乌玛尔再一次被转另一大监狱,与一些记者、名人、文学家约一百多人关在一起候审。

虽然在这些 监狱相对以前略为“轻松”,但这里的伙食很差,掺了不少沙子,难以下咽。”饭菜差得连



猪都不吃”,令人愤慨!

虽然每个星期我都从家里给他带饭,但因 很多囚犯家不在雅加达,或是家里很穷送不起饭到监狱,所以尽管自己吃不饱,但还是会把自己那份饭菜与他们分享。

如此这般的没人道的折磨,需要非常的毅力非常的人才能抗拒,而乌玛尔及其 被关押的人他们做到了,实在了不起。

因为在监狱里关押着许多国家的政治犯,为了方便交流,或者说打发监牢里乏味的日子,都在监牢里进行异国语言的教学。许多国语言都可以教,例如法语、荷兰语、日语、阿拉伯语、德语等,唯有中文不能教,因为当时当局对中文还是很敏感的很谨慎也很忌讳。尽管官员下了禁令,但是他执着的进行中文的教学,对监牢里的许多华人都有很大帮助,特别是如今还健在的哈吉先生,也是乌玛尔的学生之一有记者同乌玛尔说:“



吴志曼老师(左1)与父母亲(峇达族)合影